

胡適五論

從《努力》到《新月》的政治言論

從主張和平到主張抗戰

出使美國的再評價

在動亂中堅持民主

爲自由中國爭言論自由

張忠棟著

允晨叢刊 12

胡適五論



掌握世界新知



創造美好生活

允晨叢刊 12 **胡適五論**

作者 張 忠 棟
Chung-tung Chang

發行人 吳 東 昇

出版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東昇大樓11樓
●服務電話：5415606-7
●郵撥帳號：0554566-1

製印 唐山彩色照相製版有限公司
板橋市中山路二段531巷56號2樓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2523號

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五月廿八日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

定價：170元

PDF

序：五四思潮得失論

周策縱

在中國近代史的幾件主要事故中，發生最深遠而廣泛的影響，而又引起最熱烈的爭論的，我看沒有一件能超過「五四運動」。與這一事件和這一時期思潮發生過關係的知識份子和政治領導人物，也無比的多，像戊戌維新、辛亥革命、對日抗戰、和中共得勢而帶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都各有它們重大的意義和影響，但那些事件的性質各不相同，就長遠的，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意義和影響來說，尤其是就與知識份子的密切關係來說，我還是認為「五四」的重要性是無可倫比的。所以每一談到當代中國的一些最重要的知識份子，像蔡元培、胡適、魯迅、陳獨秀等人，就不能不提到五四運動，至少五四時期的思潮。

五四時期的思潮，主要口號，如大家所知道的，是民主和科學，即所謂德謨克拉西先生和賽因斯先生。當然，這只能說是個口號，是一種熱情的提倡和推進，在當時短短十來年內，說要能做到多少，完成多少，自然也不能完全超越客觀條件而有所奢望和苛求。可是那目標的大體正確性，和青年知識份子對文化、文學、思想、社會、政治等各方面改革的熱忱，無疑是值得十分敬佩的。

所以如要檢討五四時期思潮的得失和影響，還不能只就那十來年在科學和民主方面究竟已做到了多少，完成了多少，甚至也不能只在這兩方面的具體內容來檢討，而要看到那些思潮的背後，還有沒有一種值得萬分重視的基本精神或無形的基本觀點。

我認爲五四思潮的一個基本精神和觀點，是一種廣義的崇尚自由競爭的精神和觀點，是受到過中外「激烈的自由主義」的影響而發展出來的精神。多年前我就說過，在中國歷史上真能做到思想自由競賽，百家爭鳴的，只有兩個時代，一個是兩千多年前的戰國時代，一個就是五四時期，而五四時期的自由爭鳴，範圍更廣，挖掘和擴展得更深遠。在這方面，胡適自然是個挺特出的代表人物，其他像蔡元培、梁啟超、魯迅、陳獨秀、周作人、劉半農、錢玄同等，都各有特殊的貢獻，還有《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後面的那許多知識青年，都可說是這個自由大洪潮的巨浪和浪花。

如果說，在短短的十年裏，五四人物對科學，對民主，對哲學思想，對政治制度和理論，對歷史和學說，對文學創作和理論等，還不够有博大精深或具體的成就的話，那也是不足詬病的。這一大批新知識份子當時所發揮出來的那種真正百家爭鳴的風氣和精神，不但在中國歷史上將千古不磨，而其對現代中國的衝擊，對未來中國的啓發，一定是無可比擬的。

這個在思想上自由爭鳴的精神，我爲什麼說是五四思潮最基本最主要的特徵和貢獻呢？其實這個道理說來也很簡單明白，正如穆勒在《自由論》一書裏說的：思想言論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中國人如要達到自由民主的境地，首先就要爭取到思想言論自由。五四時期介紹了西洋各種各樣的思想學說，批判了許多傳統觀念，開闢了思想界的自由市場。這不簡單，這貢獻豈可輕易忽視！

五四人物中，蔡元培、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之所以最值得我們懷念，正是由於他們體現了爭取思想言論自由的精神。陳獨秀後來誤走了一大段路程，到去世前才大部分覺悟，魯迅也因環境的逼誘，後來越走越偏激，但最後還是要爭取自己獨立的判斷，只是對敵人壓力好反抗，對徒衆的奉承牽引卻不易擺脫。但是這些人仍無疑的都表現了五四時期爭自由的基本精神。適之先生有一次親口對我說：「魯迅是我們的人。魯迅基本上是個自由主義者。」當時我們曾對魯迅有過進一步仔細的分析，都覺得他在左聯成立前後，受過一些壓迫和誘惑

織，也就支持不了足夠的獨立言論機構。即使有覺悟的知識份子也無法促成對自由競賽的保障。不過他們在認識上自然也有短缺之處，就是對民主政治在制度上有許多必需的基礎保障往往還認識不清，所以像陳獨秀要到晚年才能省悟到司法獨立、自由選舉，權力制衡等民主制度的重要性。那些優秀的知識份子幾乎很少沒有走過「歧路」的，走上歧路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除了上面所說的之外，還有兩個特殊環境，一個是中國內在的缺點，包括有過去長期專制的歷史包袱，和當時政治的黑暗。另一個則是列強的侵略，使舉國造成一種國恥感。爲了應付這種急迫的危機，不免使人想操捷徑。凡此種種歷史的，當下的，內在的，外在的特殊因素，都可逼迫人們急不暇擇，想找到一劑速效萬靈藥，一套全盤解決的方略。近代中國知識份子，也往往由於這許多原因，去扮演了悲劇的角色。

可是五四思潮的衝擊，到底是深刻而難于完全磨滅的，受過當時自由思潮洗禮的人，往往還有許多在萬分橫逆的境遇下堅貞不變。這些人後來在他們一生中怎樣奮鬥掙扎，怎樣對付從左右兩方來的壓迫，而做出他們的努力和犧牲，若好好紀錄下來，一定是篇非常悲壯動人的史詩。

去年美國加州大學出版了薇娜·史華慈 (Vera Schwartcz) 教授的新著《中國的啓蒙運動：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遺產和知識份子》，她花了許多時間訪問了大陸和臺灣的五四

時期知識份子，紀錄分析了他們這六十多年來的遭遇和掙扎。從這裏也可看出五四思潮對中國知識份子終生的深刻影響。同時也可發現，那些知識份子也有不少人還不曾徹底明瞭，五四的真精神在於能有那自由競賽，百家爭鳴的局面，在於能尊重思想言論自由。當時未能切實完成的，乃是沒有建立而且推行一種能切實保障這種基本自由的政治法律制度。這其間的關鍵問題之一，是當時中國沒有創建好幾個，至少兩個真正的民主政黨。從二十年代中期開始，蘇聯列寧、史大林主義式的革命政黨組織移植到了中國，在這種制度和運作方式下，不可能保障思想言論自由，也不能真正防止濫用自由。大家都知道，五四運動本是對不自由，不民主的一種抗議，由於這種抗議精神的爆發，發展出了自由競賽的局面。有了這種局面，就應該建立一種能保障這局面的制度，然而當時中國採取了武力革命的方式，蘇化的政黨成為主要勢力，造成真正民主政治的難產。於是有人就來責備五四思潮，從右的方面說，說它那懷疑的精神，偶像破壞的作風，是一種全盤否定論，因此對中國傳統過度破壞，才使得反自由、反民主的勢力抬頭。從左的方面說，說它中間有人過于受了資本主義自由思想的影響，削弱了反帝國主義的力量。其實呢，這種左右夾攻都忽略了五四對思想言論自由精神的貢獻，也忽略了像蔡元培、胡適這種知識份子對自由民主的提倡，對建設新文化的努力。而這才正是五四思潮中最值得我們體認的。

張忠棟教授對胡適的研究，在這方面正可提供我們參考，他用平實冷靜客觀的態度，來敘述分析胡適一生爭取自由民主的經過，正合於中國目前的需要。希望大家，尤其是知識份子和政治工作者，從他的研究中吸取智慧和教訓來。

——一九八七年四月三十日于陌地生

自序

我原來讀美國史和美國外交史，研究方向側重於中美關係。這幾年研究胡適，寫了五篇論文，乃至現在可以集結成書，其實也與研究中美關係有關。

一九七八—七九年獲得美國傅爾布萊特訪問學人獎，在史丹福大學做研究，正好趕上中美斷交，美國承認中共。不久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的李新到美國，也到史丹福大學拜訪，帶來一些他們新編的資料，其中〈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往來電稿〉引起我的注意，我特別影印一份帶回。回到臺北之後，中共方面又陸續出版了三大本〈胡適來往書信選〉，也是非常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有了這些資料，加上胡頌平所編的十大本〈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再參考一些其他的書籍文章，我決定嘗試研究胡適在外交方面的意見以及他駐美大使任內的表現，因此首先寫成〈從主張和平到主張抗戰的胡適〉以及〈胡適使



美的再評價》兩篇論文。

這兩篇論文並沒有完全脫離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也許應該到此為止。但是因為中美斷交帶動國內政情的轉變，許多報紙刊物常常要我發表政治方面的評論，我對胡適當年的政治意見也產生了強烈的研究興趣。於是我閱讀更多的資料，特別是他的政論文章，陸續又寫成《胡適從〈努力〉到〈新月〉的政治言論》、《在動亂中堅持民主的胡適》以及《為自由中國爭言論自由的胡適》三篇論文。

胡適一生，是學術界的領袖，也是政治上很有影響力的人物。他的政治興趣，從上面五篇論文看，似乎開始於辦《努力週報》，而且他在辦《努力》之前，也曾有過「二十年不幹政治，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諾言。其實他十幾歲到上海讀書，就在澄衷學堂發起自治會，就讀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就受到梁啟超《新民說》的震盪。不久他轉學到中國公學，那裏有很多革命黨人，也可以看到東京出版的《民報》，他雖然沒有參加革命黨，但是他參加了與革命黨有關的競業學會，也為《競業旬報》寫了不少文章，有時候一期的文字，「從論說到時聞」，差不多都是他做的。後來他到美國留學，最後雖然選擇哲學做他終身的研究事業，但是他也選過政治方面的課，發表過政治意見，發起組織政治研究會，甚至參與美國大選活動，於一九一二年支持進步黨的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於一九一六年支持民

主黨的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連任。他這些早期的政治興趣，並不難探索，要想有所了解，只須讀他的《四十自述》和《留學日記》，以及唐德剛譯註的《胡適口述自傳》。我的五篇論文，也沒有涵蓋胡適自《努力》以後的全部政治言論與政治活動，至少還有一個題目是值得寫的，那就是胡適與憲政的實施。胡適在國民黨和共產黨衝突最厲害的時候，堅決地和政府站在一起，支持憲政的實施，同時對於後來憲政實施的偏差，他也有強烈的批評。這中間的牽涉很多，材料尚未盡出，等他日舊的人物消逝，政治環境更新，再來把其中的歷史補寫，將更能彰顯胡適的全部政治主張。

五篇論文集結成書，並加入兩篇附錄，中間曾經得到一些朋友的支持和幫助。最早鼓勵我繼續寫作的，是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的李有成和臺大哲學系的郭博文。在資料搜集方面，先後惠予協助的有沈雲龍、劉紹唐、劉國瑞、何懷碩、王志維、傅正和陳宏正等幾位先生。特別贊成進而協助本書出版的，是《當代》的主編金恒煒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黃進興。陳忠信和王世森兩位先生花了很多精神校讀書稿，並訂正錯誤。對於所有這些朋友的盛情，我都要說聲謝謝。

周策縱先生是研究五四運動的大家。今年二月二十四日胡適逝世二十四週年，中國時報舉辦紀念演講會，他是演講人之一，我有機會和他再度相見，很景仰他的溫文儒雅。他演講

胡適五論

之後回美國，正好這本書準備付印出版，所以決定請他寫序。承蒙他在審閱學生論文的百忙之中，慨允趕寫序文，增加本書光彩，我更要表示十二萬分的謝意。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四日 張忠棟 序於台北

目 錄

序：五四思潮得失論·····	周策縱·····	一
自序·····		一
壹、從《努力》到《新月》的政治言論·····		一
貳、從主張和平到主張抗戰·····		六七
叁、出使美國的再評價·····		一一三
肆、在動亂中堅持民主·····		一五七
伍、爲自由中國爭言論自由·····		二五九
附錄		
一、胡適心目中的民主和反對黨·····		二九七
二、從幾封信看傅斯年的風格·····		三〇三

壹、從《努力》到《新月》的政治言論*

自由主義學者在近代中國扮演什麼角色？他們的政治見解如何？他們對實際政治有什麼影響？他們的政治遭遇又如何？要想了解這些問題，胡適可能是最鮮活的例子，很少有人像他一樣做了那麼多事情，也很少有人像他一樣留下了相當完整的紀錄。民國十幾年間，有軍閥割據和北伐統一，有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初期鬥爭，政治的糾葛十分錯綜複雜，一般人看得眼花撩亂，也看得心灰意冷，但是胡適一直堅持民主自由的理想，反對激進的革命論調，批評當權者的反動保守，沒有絲毫妥協退縮。他這一段歷史，尤足說明近代中國自由主義學者的艱難奮鬥（註一）。

* 本文原為勞師貞一八秩大慶祝壽而寫，曾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發表。

註一：美國布朗大學賈祖麟（Jerome B. Grierder）教授曾經研究胡適自留學回國一直到抗戰開始的思想言論，

從《努力》到《新月》的政治言論

《努力》和《新月》，是胡適和他一班朋友在這段時期先後創辦的刊物，也就是他的主要言論陣地。在此之前，胡適從回國以後參加《新青年》，替《每週評論》寫過稿，也在民國八年六月陳獨秀被捕以後接替《每週評論》的編務。他在《新青年》一直主張不談政治，不幹政治，在從事政治改革之前，應先致力於文學、思想、社會的改造。《每週評論》是他民國七年底自北京南下奔喪時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人所創辦，目的是想在《新青年》之外另有一份專門評論政治的刊物。等胡適回到北京，這份新刊物要他寫稿，他只翻譯了幾篇短篇小說。接替《每週評論》的編務之後，胡適無法避免談政治，又想針對有被盲目接受危險的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等稍加批評，因此決定談點基本問題，並且寫了一篇《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和李大釗等人發生一場筆戰。筆戰未了，《每週評論》被北京警察查封。隨後陳獨秀前往上海，把《新青年》的編輯出版工作也帶到上海。到了

寫成專書，頗為詳盡，見 Jerome B. Grier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惟此書由外國人士用英文撰寫，出版於十餘年前，現在筆者採用若干新出資料，就若干環節重加研究，另以中文撰寫，希望有推陳出新之處。

民國九年五月，新青年開始變成專門宣傳勞工運動和共產主義的刊物，胡適和一班在北京的朋友試圖挽救，但是沒有成功。民國十年一月，新青年也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查封（註二）。

新青年和每週評論沒有了，胡適和他的朋友缺少言論機關，然而他們面對軍閥政治的黑暗，又有許多話要說。胡適這時對於政治的關切，以及相信知識份子應該監督政府的態度，顯然要比過去積極。民國十年紀念五四運動兩週年，他寫了一篇黃黎洲論學生運動，強調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裏，政府太卑劣腐敗，青年學生界就會發生干預政治的運動。他指出黃黎洲在明夷待訪錄中說過，學校是天下公是公非的所在，國立大學要干預政治，一切學校都要做成糾彈政治的機關，國立學校要行使國會的職權，郡縣立學校要行使郡縣議會的職權。在最後的結論中，他更是指明黃黎洲說過學生運動是「三代遺風」，是保國的上策，是謀政治清明的唯一方法，認為這樣的議論，在他們那個時代裏有值得紀念的價值（註三）。在民國十一年二月七日的日記中，胡適又說：「自從每週評論被封禁，我等了

註二：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七十年），頁一八九—二〇〇。關於新青年在

上海出版或移回北京出版，胡適、陳獨秀和一班朋友曾經書信往還討論多次，這些書信都收入張靜虛編，中國現代出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五四年），甲編，頁七一—一六。

註三：胡適，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書局，民國二十年八版），卷一，頁一一—一五。